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书写疗愈对比探究

——以福克纳和赵健秀的作品为例

戴方方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有高度的相似性, 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性和群体的身份属性又赋予南方人和华人自身创伤的特殊性, 使两者有较强的对比。福克纳与赵健秀分属美国两个不同族群的作家, 书写“创伤”的创作立场大相径庭。因此, 借用创伤理论探析二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 进而研究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创伤叙事中作家不同的书写立场产生的不同创伤修复效果, 为寻求最佳的书写疗愈方式提供研究参考。

[关键词] 美国; 南方文学; 华裔文学; 创伤修复

[中图分类号] I 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1) 03-0094-08

一、引言

美国南方文学和华裔文学因其独特的地域和历史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的回忆和少数族裔移民的新伤旧痛一起见证了美国的创伤史, 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的创伤文学令人瞩目。作为战争幸存者后代的南方代表作家中, 论描写战争的作品数量及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以福克纳为最。步其后尘继续书写南方文学的作家也不在少数, 但战争过去多年, 他们身后的历史包袱已逐渐放下, 因此, 福克纳的创伤文学撑起美国南方创伤文学的半边天。美国的另一个群体华裔的遭遇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早期在美华人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本族群的历史, 也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父权制的文化创伤。不同于探讨族裔传统、身份意识等研究切入点, 创伤叙事是解读美国华裔文学的一个新视角。被称为亚裔美国文学“教父”的赵健秀是美国华裔作家群体中的一个全才, 他认为自己既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美国人, 更不是两边倒的“伪华裔”, 堪称构建华裔英雄主义、重写华裔历史的领军人物。历史与父辈的包袱给福克纳与

赵健秀二位作家的创作都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者又分别为南方文学和华裔文学的重要作家, 他们的创伤叙事对象有高度的相似性, 黑奴与华人都遭受过种族创伤, 但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和不同的民族性又赋予黑奴及华人自身创伤的特殊性, 使两者创伤叙事中的人物形象——黑人奴隶与华裔劳工、华裔“坏女人”与白人“淑女”有一定的可比性。叙事疗法创始人麦克·怀特认为, 叙事作为一种后现代心理治疗法, 能帮助受伤者重建自我价值, 恢复自信^[1]。美国南方作家与华裔作家都曾借助创伤叙事策略叙述触发人物创伤的历史事件, 因此, 选取南方作家和华裔作家尤其是福克纳和赵健秀笔下人物为案例进行分析, 便可对美国南方文学和华裔文学作家创伤叙事的不同书写立场及其对创伤的修复效果管窥一二。

从研究范围来看, 国内学者对于文学创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单个作家一部或多部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分析, 对作家集体的研究著作出现在2010年后。目前国内学界对不同族裔作家创伤文学的对比研究仍欠缺。笔者试图借助心理学的创伤理论, 选取福克纳与赵健秀的代表作中的经典人物形象为例, 重点分析“创伤”主题是如

[收稿日期] 2020-12-15

[作者简介] 戴方方 (1983—), 女, 福建莆田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何通过美国南方文艺复兴创伤文学和美国华裔创伤叙事中的“黑奴”“南方最后的贵族”“苦力”“淑女”“坏女人”等形象表现出来，并对二者创伤叙事的书写立场及修复效果进行对比，探寻最佳的书写疗愈方式。

二、白色创伤的黑色疗愈及白人审美“趋同”化的创伤修复局限性

（一）福克纳“黑色疗愈”的创伤书写局限性

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虽然出生在战后，但家族先辈参战的经历使他们普遍接受南方奴隶制，留恋南方的美好往日。相比美化、宣传奴隶制，把畸形的主仆从属关系描绘成一派和谐的南方作家，福克纳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含蓄许多，没有露骨的歌颂。福克纳认为南方社会是病态的，白人残暴镇压黑人以获取绝对的统治和话语权，黑人身心俱创，而这种暴力统治将对白人主子产生精神反噬，使白人压抑、绝望，濒临崩溃、癫狂。福克纳认为只有解构白人的暴力性，允许被压制的黑色与之共存，才能完成救赎与疗愈，因此福克纳对黑人的同情大多是通过书写白人镇压黑奴的创伤体现。在《八月之光》中福克纳直接描写了黑人的创伤。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一生经历了多次创伤，受尽了苦难，最终被白人枪杀并在断气前被割下生殖器。弗洛伊德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理论认为，创伤患者具有重建过去的执念，童年的创伤体验会无意识地一再重演^{[2]154}，在执念的引导下大脑无法正常疏导某个时间点猝不及防的外部刺激，让创伤的种子深埋于潜意识，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治愈童年创伤。乔孤独冷漠的性格形成在他的童年是有迹可循的：一出生就没了双亲导致情感缺失，没安全感是其潜意识受创的表现。在养父母家经常遭毒打助长了他的攻击性和暴力行为，为了让老马跑得快一些，他用木棍使劲抽打马的头部致其死亡。这种变态、扭曲的心理是创伤后遗症的投射。从小被白人追着骂“小黑鬼”“小杂种”，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也试图融入黑人群体，可是连黑人也排挤他，在黑人和白人的夹缝中他深受

种族不确定性的伤害。成年后的乔从时间上看已经脱离了童年创伤，但潜意识里仍执着于“虐即是爱”的认知不能自拔，因此在恋爱上也伤痕累累：女友和情人都因他的黑人血脉离开他，边缘化的种族身份使他总受欺压、终被抛弃，一气之下他割断了白人情人乔安娜·波顿的喉咙。乔是种族主义的殉葬品，无尽的创伤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把暴力作为创伤救赎手段只能起到短暂的心理补偿，无法帮他确立自己的身份，正如他临终前忧郁的顿悟：“我从未走出这个圈子，我从未突破这个圈，我自己造就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圈。”^{[3]243}关于修复创伤，弗洛伊德认为，“忧郁”是个体受创后的一种执念，使个体无法正视和转移受创的情感，长期陷入冷漠自卑；不同于持续性的忧郁，“哀悼”才是修复创伤的正确途径，哀悼有悲伤的期限，让个体有能力向前看，在一段时间后移情到新的客体上达到疗愈的目的^{[4]243}。因此，乔想要治愈创伤，就得跳出“强迫性重复”的僵局，否则他永远被童年创伤的阴影中断哀悼，陷入“忧郁”。此外，对他施暴的南方白人文化霸权语境使他丧失了良性的抗压能力。乔的悲剧也反映了白人至上主义对南方作家写作立场的影响，福克纳这一叙事安排发人深思：仿佛只有对乔处以私刑才能消除白人心中黑人威胁论，缓解他们无法排遣的忧虑。

福克纳对种族歧视的声讨还间接体现在南北战争给南方没落贵族带来的创伤。以《喧哗与骚动》为例，20世纪初美国南方种植园神话破灭，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已成定局，催生了一系列深受白色身份危机困扰的创伤人物。其中白痴班吉的伤最令人心痛，他经历了改名、凯蒂失贞和被阉割三重创伤；昆丁为了捍卫南方传统的价值观，在异乡投河自尽；剩下看似正常的孩子要么风流堕落，要么冷酷邪恶，没担当的康普生太太则是白性受害者和施暴者的结合体，也是造成创伤的帮凶。福克纳认为，这一家子弥漫着疯癫和阴郁，他们只有放下“白性”，挖掘黑色“自我”，才有可能修复创伤。因此，福克纳用多视角的叙事方式代替虚弱的康普生们的讲述探寻这种疗愈转换的可行性。小说通过三个儿子的内心独白展示了三兄弟饱受创伤的表意识，揭示出家道中落使他们陷入长时间的非理智、崩溃的状

态,接着又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了被白人边缘化的“他者”迪尔西被压抑的黑色无意识。传统的全能全知视角使黑人的真实生活较为客观地呈现出来,读者也恍然大悟:黑人女仆迪尔西才是竭力维护这个大家庭的中流砥柱,与白人传统观念里黑人是野蛮、粗鄙、非理性的化身不同,迪尔西的家庭是一个经历了暴风雨摧残仍坚强有生气的地方,虽然是康普生家族肉眼可见的衰败使迪尔西沉睡的黑人种族意识逐渐觉醒。迪尔西带着班吉上黑人教堂,并叫板穷白人“没出息”“他不够格上白人教堂,又认为黑人教堂不够格,不配让他去”^{[5]317}。迪尔西认识到黑人不比白人劣等,公然反抗杰生“我比你有心肝,虽然那是黑人的心肝”^{[5]233}。

心理学家认为,叙述创伤意味着创伤的再现,它有起因、经过和结果,它帮助受伤者理解导致它的事件,叙事的框架感使记忆变得易于管理,有利于排解创伤^[6]。康普生三兄弟的叙事以意识流的方式呈现,反映了他们对造成创伤的事件和根源的认知是不客观、歪曲的,无法正视他们的白性身份需要被重构的事实。迪尔西这个穷困但积极向上的黑色“他我”本可以帮助白人疗伤,但迪尔西的故事是由全知全能的第三人讲述的,不同于三个白人孩子,福克纳没有给迪尔西发声的机会。迪尔西没有叙事的话语权,她在第三人称叙事中的声音只不过是白人的传声筒,她站在白人的立场说合乎白人主子利益的话。福克纳把迪尔西塑造成一个二维的、没有自我意识却深知自己“他者”身份的“好黑鬼”,她的觉醒是社会变革的结果,不是一个纯粹黑人自发的觉醒,她不具备纯粹的黑性,因此她与这个白人家庭无法建立真正的黑色情感联结,也就无法帮助疗愈白人后代的“忧郁”。

(二) 赵健秀的白人审美“趋同”化的创伤书写局限性

在美华工也有一部血泪创伤史。19世纪初,资本和殖民的双重扩张需要大量廉价劳工,于是西方殖民者盯上了中国的劳苦大众。初入美国的第一代华人——华工的悲惨经历和所受歧视在不少华裔文学作品中都有再现。讲述和回顾有关创伤与生存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华工给后代讲述为了生存遭受的伤痛,

个人的创伤通过情感传染给听众,激发集体创伤体验。听众不仅仅在听故事,他们还间接体验父辈华工的伤痛,他们共同承受集体记忆、历史和创伤。不同于个体的心灵创伤,许多学者更关注个人创伤与集体“文化创伤”的必然联系。杰弗里·C·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是一种新型科学概念,指向之前发生过的毫无相似性的事件、社会结构、认知、行动之间无因果关联的连接^{[7]1}。一次影响恶劣的历史事件就足以给整个族群意识深处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文化创伤”若加以正确引导,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以赵健秀的小说《唐老鸭》为例,作品表现了种族歧视和白人主流文化对华工历史的静音给移民二代造成的“文化创伤”。从作家对族裔创伤的书写中读者不难看出,某一群体经历的创伤会对其后代身份产生不良影响,这是因为创伤具有代际传递的功能。第一代移民把华人的记忆传给了第二代,移民二代一出生便是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远离中国文化之根,原以为从小在美国生长就能顺利融入白人社会,不料却和父辈一样遭遇边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厌弃自己的身份。为了重塑主人公唐老鸭的华裔属性,父辈给唐老鸭讲自己族裔的历史,培养他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让唐老鸭每日重复做华工修路梦,主动挖掘出被白人主流社会静音的一段屈辱史。心理学界有不同的释梦理论,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呈现,越是被压制的欲望越容易通过梦境释放;完形梦境治疗则把同一梦境视作梦者潜意识不满当下生活状态,重复的梦境可以帮助梦者觉察心理失衡,完成心理整合^{[8]51}。一方面,华工修铁路的梦境使唐老鸭觉知潜意识,由蔑视中国文化、憎恨华裔身份转为追寻父辈英雄传统,重构被主流文化“去势”的华工历史,对抗话语霸权,完成身份认同;另一方面,父辈有意讲述关公等英雄好汉的事迹侧面帮助唐老鸭转移了“文化创伤”带来的困扰,使其避免长期浸润在受学校白人欺凌导致极度反感华裔身份的病态情绪中。赵健秀安排父辈引导唐老鸭进行完形治疗(Gestalt therapy)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的“哀悼”原理并无不同,治疗的焦点都是过去未完成的事件,强调当事人修复创伤

的主动性，释放当下未表达出来的焦虑、挫伤感，解决原有的僵局，顺利完成“哀悼”、避免郁结。

赵健秀书写创伤的努力还体现在颠覆华裔男性长期背负的长辫子苦力、娘娘腔模范少数族裔代言人陈查理、邪恶的“黄祸”傅满洲等刻板印象。为驳斥美国主流文化故意“阴柔化”华裔男性形象，重建华人英雄传统，赵健秀奋笔反击。仍以《唐老鸭》为例，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工头“关公”彪悍、阳刚，胜过许多白人，和工友一起一天铺设10至12英里铁路而创下世界纪录；又如戏剧《龙年》中的华裔导游弗雷德，每次导游结束都用英语俚语辱骂客人，也是赵健秀重塑华裔阳刚气质的尝试。此外，赵健秀还塑造了一系列比白人男性更具性魅力的人物，例如《甘加丁之路》中的龙曼·关父子，父亲龙曼·关是“唐人街的花花公子”^{[9]387}，到处留情、迫切渴望被白人主流文化同化其实是种族主义和文化身份的不确定带来的心理创伤的表征；儿子尤利西斯继承了父辈的文化创伤，虽然一贯坚持自己作为华人的异质性，但从小沉湎于色情杂志，有数不尽的白人性玩伴。赵健秀在书写时正视本族群受歧视的悲惨经历、挑战对抗白人霸权话语对华裔男性的“去势”、重塑华裔男性魅力所做的努力不容置疑，但殊不知，文学中的对抗策略如应用得当有利于提升族裔凝聚力，若过犹不及容易走向“趋同”白人审美的另一极端：把华人塑造成酷似白人高大帅气、性感而又不乏白人女性伴侣的不实形象可能导致部分华裔不能理性看待自己和白种人在外形上的差异，造成自卑心理，模仿现实中最接近的白人男性，反复陷入“文化创伤”的怪圈。

综上，黑奴和华工作为20世纪前美国最受歧视的两种人，种族主义给二者及其后人均带来不可逆的创伤，同时南方伊甸园神话使黑奴遭受的创伤疯狂反噬镇压他们的老南方贵族及其后代。创伤以代际的方式在受创者中代代传递，创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和疗愈的效果各异，笔者认为除去个体受创程度轻重、社会历史的因素，作家书写立场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创伤的修复。福克纳对身世悲惨的黑人的刻画充分显示了他对种族压迫的愤懑和否定，但作为正统的南方人，他和其

他作家一样仍怀念奴隶制昔日的光环，因此在塑造人物时无法跳出白人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集体无意识的思维限制：同情黑奴，但多少带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不认同心态，对美好的主仆关系治愈南方创伤的可能性抱有期待，以致当所有南方人的创伤身份重构都指向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奴隶制时，福克纳明知衰败的战后南方无法适应工业化生产经济，却不希望动摇老南方种植园经济的根基。他一边批判种族主义，一边视黑人为二等公民并对他们按照顺从与否作了好坏之分，这奠定了福克纳创伤叙事的基本立场：书写创伤的人陷入“忧郁”，内心不愿告别南方神话，对邦联烈士的“哀悼”没有顺利完成，必然造就小说中未完成“哀悼”陷入更大痛苦的创伤人物，也反映了作家书写立场的局限性。反观赵健秀在处理种族歧视给华裔造成的创伤时，充分利用回忆、讲述创伤经历的方式来树立华裔群体正确的自我认知，保持华裔特殊属性的同时颠覆白人霸权话语强加给老华裔的刻板印象和弱势地位，寻找文化自信，重构阳刚的华裔男性身份。如果说福克纳书写的种族优越感、怀旧情绪和对主仆伊甸园关系不切实际的幻想致使其笔下的创伤人物难以完成疗愈，那么赵健秀书写立场也有令许多学者诟病的地方：把关公塑造成精神和肉体上近乎暴力的完美，并按照白人的审美标准塑造遭受文化创伤的男性形象实际上是变相的“趋同”，这种略带极端的创作立场有顺应白人霸权话语的嫌疑。如果赵健秀在创作时能客观承认华裔男性与白人外形上的差异，无论高矮胖瘦，华人的腰板永远是直的，也许更有利于华裔的疗伤和白人话语权的重新分配。

三、父权制背后的“淑女”崇拜和“厌女”症对创伤修复的局限性

（一）福克纳“淑女”崇拜的创伤书写局限性

父权制是一种延续了数千年的由男性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特权，也是全世界大多数文化共有的文化现象。南方清教徒式的父权制宣扬禁欲主义，扼杀人的天性，要求女性依附于男性，一生以服侍家庭为重心，她们必须柔顺、优雅、高

贵、纯洁。南方“淑女”是种植园经济和清教父权的衍生物,时代造人,种植园经济被摧毁,资本主义奴隶劳动制的终结,它所造就的典型人物也随之消失。在南方文学中,大部分淑女是社会变革的殉葬品,与其说南方作家喜欢用她们的滑稽、怪诞来博人眼球,倒不如说是端庄、荒谬外表下的深刻讽刺。

威廉·福克纳的作品中呈现了大量创伤人物和令人无限唏嘘的南方淑女。以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为例,故事讲述者罗莎·科德菲尔德小姐性格孤僻、行为异常。她在讲述萨德本的故事时,充满了对男性的怨恨和强烈的主观性,具有典型的创伤特征。罗莎的第一重创伤来自至亲的死亡:母亲难产、父亲自杀、外甥强杀哥哥、姐夫被砍死,目击亲人死亡是造成创伤的诱因。罗莎讲述故事时语言混乱,她的大段自白“他们肯定已经告诉过你”“我有个故事但我不知道怎么讲述它”^{[10]127}的非线性叙事的停止符合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TSD)的定义,即人在目睹关系亲近者的死亡等情感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根据创伤理论,创伤事件会使主体的认知能力受损,无法直线叙述或叙事中出现语义断层。原生家庭让她尝遍成长的辛酸,让她遍体鳞伤,虽然她也曾对爱情、婚姻有过期待。内战后,姐夫萨德提出和罗莎“像公狗母狗一样配对”^{[10]174},其变态的求婚方式狠狠羞辱了“淑女”的自尊,为了坚守“淑女”的节操她放弃了为数不多成为人妻的机会,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她不停地受伤、不停地失去女人应有的身份:母亲、女儿、妻子。正如康普生先生所说,内战把“淑女”变成了“鬼魂”^{[10]7},罗莎无异于回魂女鬼。美国精神病学家朱迪斯·海尔曼认为,创伤者如果想从伤痛中恢复,应努力建立与社群的联系。只有在公共话语空间重建难以言说的创伤历史才能打造心理重建能力^{[11]187}。因此,福克纳安排罗莎作为叙述者,她的经历蔓延给听者,成为一个群体共同的创伤体验,也暗示了罗莎试图与过去和解,主动修复创伤的意图。然而时间和叙述没有平复罗莎对父权制的仇恨,如前文所述,创伤的修复有赖于对已完成的事件的倾诉,罗莎的叙事在形式上完成了创伤修复,但在父权文化的毒害下,她从未找到女儿、妻子、母

亲等正常女性的身份,因此,她叙述的是没有开始、没有发展、也没有结局的创伤事件。福克纳同情罗莎,但他没有把罗莎塑造成与时俱进、反叛的成长女性,她从未享受淑女的正常权利却执意遭受南方妇道软弱、不具进攻性却“喋喋不休怒气冲天”^{[10]3},反而有作者“妖魔化”罗莎的嫌疑。可见,福克纳在文本中忍不住把对旧南方复杂的眷恋投射在创伤人物身上,强烈抨击奴隶制、清教给淑女带来的创伤,但仍然无法舍弃传统的南方妇道观。

如果说罗莎是一位毫无争议的创伤淑女,那么《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里的这位淑女则是受害者和被受害者的结合体。有人格障碍的艾米丽揭示了社会环境压抑下的又一病态淑女:名媛艾米丽毒死性向不明、暧昧却无意与她成婚的北方工头荷默,守着死尸过了40年。父权思想和禁欲主义摧残了曾经优越感满满的南方淑女们的爱情观。从小失去母爱造成艾米丽童年情感缺失的潜在创伤,父亲不但切断她所有的社交,还以阶层不对等为由赶走了女儿所有的追求者,导致她爱情观畸形。如上文所述,与外界联系是修复创伤的根基,无处诉说她只能独自压抑倾泻的声音,失去创伤疗愈的可能。北方工头荷默的出现承载了艾米丽全部的情感寄托,但邻居们认为“格里尔生家族的人不会看上一个北方佬”^{[12]44},把她与荷默的出双入对看作是“全镇的羞辱”,甚至认为艾米丽的死是“再好没有的事了”^{[12]46},艾米丽也试图反抗、挣脱父权制的枷锁,但镇上居民的舆论和南方人对“淑女”传统的坚守也注定了她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重塑自我,也无法凭借微弱的力量建立治疗创伤的抵御机制。可见,在男权社会遭罪的“淑女”也可能因家庭、世人对她们不切实际的期望牺牲自我,长期压制正常的人性、欲望导致心理异常,最终做出反社会的行为而跌落神坛。艾米丽死了,一朵玫瑰凋零了,男人们心中的丰碑也倒下了,福克纳同情这个悲惨的女人,为了表示敬意,向她献上一朵玫瑰。福克纳以玫瑰比喻衰败的南方,为艾米丽献上的玫瑰既是对南方“淑女”的崇敬和告别,也是对南方神话的维护和缅怀。

还有一类“淑女”个性鲜明、桀骜勇敢又

怜悯包容，仍以《押沙龙，押沙龙！》为例。萨德本的女儿朱迪斯身上有着让男性自惭形秽的狂野、冷静、坚强和主见，可以说她颠覆了传统的“淑女”形象，颇具雌雄同体的魅力。她用行动努力摆脱父权制的束缚，但她的人生也不可避免地充满悲剧。她对父亲忠诚、认可，有意无意在父亲面前展现心中的雄心和男儿气质，均未能撼动哥哥亨利在父亲心中的继承者地位。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家中的边缘化地位时，她开始觉醒并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可这一历程中的种种阴差阳错似乎都是莫大的讽刺：镇定观看血腥决斗场面的是朱迪斯，和父亲、未婚夫一起加入联邦军的却是亨利，那个被父亲要求观看决斗赛时“边尖叫边呕吐”^{[10]24}的哥哥；满心欢喜地等了四年终于盼到查尔斯·邦与她的大喜之日，亨利却枪杀了邦并把尸体扔在她面前。守活寡的朱迪斯把邦和他情妇生下的有黑人血统的儿子接到自家细心照料并治好他的黄热病，却导致她自己染病去世。海尔曼的创伤复原理论指出，创伤修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般有三个阶段：建立安全感、叙述创伤经历、与自我和解，重建自我和对外界的信任^{[11]155}。朱迪斯为萨德本家族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可却从未得到父亲的重视，符合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对父权思想的想法，“当一切都可以归结于没有男性生殖器的问题上时，女人不可避免地被湮没或被完全忽视”^{[13]226}。她是福克纳塑造的第一位成长型“淑女”，为改变被家族男性“边缘化”的弱者形象，她通过行动使自己在家中占据有利地位，丧失所有的至亲至爱后，她收养了邦的儿子来弥补未能成家当母亲的缺憾，朱迪斯建构女性安全感的努力不容忽视。然而，无论福克纳多么敬仰这个正面意义的“淑女”，在作品中既没有朱迪斯心理的正面描写，也没有给她话语权，大多时候她是被静音的。在她与昆丁祖母的一次长谈中，她表示渴望用文字留下点存活的印记，但她记录下来的也仅仅是关于未婚夫邦的经历，而不是她自己的声音和创伤体验。归根到底，在种植园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的时代，父权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淑女们重构自我的道路布满荆棘，福克纳终究还是站在男性视角把朱迪斯塑造成刚强却不得不独自疗伤的矛盾体，也不难理解

萨德本从战场回家后朱迪斯胆怯、压抑和收敛反叛的绝望，体现了福克纳一贯清醒与无奈的文学思想。

（二）赵健秀“厌女”书写的创伤修复局限性

如果说“淑女”是美国南方社会的“丰碑”和“传统”^{[14]1771}，那么“龙女”“荷花”则代表了西方人眼中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19世纪前，重视家庭、以多子多福为传统的中国人一致认为本分、守妇道的女人是不会远离家乡的，早期来到美国的华人女性被等同于失节，男人们缅怀“淑女”，却不爱歌颂失足女，因此华裔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反传统女性悲剧和创伤的正面描写。赵健秀的作品在修正华裔男性阴柔化刻板印象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然而对华裔女性的批评、不认可也是他一贯的文风。

《甘加丁之路》充斥着被匿名、被消费的女性画面，华裔女性被歪曲成私生活混乱的负面形象，似乎她们在作品里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供男性摆布。文本中的女作家潘朵拉被塑造成视婚姻为儿戏的女人，她的名字 Toy 暗指她玩物般的存在，与白人结婚不久便离婚勾搭上黑人，靠出卖族裔利益、迎合白人的新书一夜成名，再嫁给本尼迪克，龙曼·关也为她着迷。潘朵拉在作品中被妖魔化成不守本分的母亲、妻子，“成名后的潘朵拉长期不待在家履行作为女人和妻子的责任义务，周游各地、客串讲学、搞诗朗诵，从不带丈夫本尼迪克，因为这有伤新华裔女性的形象”^{[15]330}。除此之外，赵健秀还挖苦、嘲讽“绝不嫁给东方人”^{[15]252}的潘朵拉是篡改中国历史、丑化族裔形象的罪魁祸首，“这是自从潘朵拉·托伊的《征服者女人》以后出现的新东西（电影中的女勇士）……在潘朵拉·托伊创造这些女勇士之前，她们在中国电影中是看不到的”^{[15]340}。借此，赵健秀影射靠嫁白人上位的华裔女作家是华裔男性被阴柔化、被静音的帮凶，他批评潘朵拉拥有太多男性的声音和力量，违背了封建父权制对真正女人精神实质的定义：顺从、压抑、守本分。华裔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张敬钰批评“华裔美国男性虽然穿着全幅盔甲，但却用压迫者的形象重塑自己，倡导男性的进攻性，有很大危险性”^{[16]377}。赵健秀无视男性支配欲对女性的偏见，塑造出的潘朵拉形象，与其说

是新华裔女性反传统特质的诠释,不如说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构建出的反面教材。从古至今,性别暴力在各种文化中无处遁形,对华裔来说,性别和种族更是被微妙地糅合在一起的两个问题,华裔男性被白人主流文化静音也常伴随着他们对女性的敌视。

联合国将“性别暴力”定义为“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或性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17][112]}。表面上看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女性伤风败俗,但看似不贞的她们可能也遭遇了难以言说的性别创伤:首先,作品中的华裔男主角常被塑造成比白人男子更具吸引力的阳刚形象,但他们只以征服白人女子为荣,比如尤利西斯·关,艳遇过无数白人女性唯独没有对亚裔女人表现出兴趣。透过这一纵情过度的男性角色,读者看到了作者对许多无名氏女人形体的露骨描绘,却未见男主与她们中任何一人产生情感联结。无疑,这种情感剥离也是作家为了宣扬华裔男性的绝对阳刚气质,凸显族裔性男权中心意识、刻意模糊性别压迫性。其次,华裔反传统女性在赵健秀的作品中大多没名没姓,缺乏细节的描写,被剥夺叙事的权利,她们因为主动接受白人至上的秩序,背叛华裔男权、传统,妨碍华裔男性建构阳刚形象遭到作家的批判和遏制。与作家力图利用白人女性烘托尤利西斯·关的手法类似,所有与华裔女性有关的话语都由作家手中那支男性中心意识的笔掌控,华人女性没有表达思想的可能,即使是被赋予姓名的潘朵拉也不例外。这样不公的书写引发了不同的声音质疑是作者对“单身汉”社会“厌女”情结的反讽,还是被白人剥夺了父权的华裔男性全盘接受暴力阳刚美学、有意而为的性别暴力?

反观福克纳,作为南方种植园主的后代——高贵“淑女”的忠实守护者,秉承了美国南方贵族对普通百姓洗脑的精神核心之一:保护、尊崇女性。因此,他笔下的“淑女”即便是牺牲品也必须塑造得令人同情、崇敬,然而同情不合理旧制度的催生物悲惨“淑女”时却剥夺成长型“淑女”的叙事权利,难免有作家美化南方种植园落后“妇道观”的嫌疑。前文提到想要修复创伤,受害者得打破沉默、重塑自我,赵健秀不但没有赋予华裔女性言说的机会,还过于主

观地妖魔化同族女性。如果说白人的霸权话语让全体华裔被边缘化,那么同族男性作家歧视性的斗争策略则让遭受种族创伤的华裔女性雪上加霜。赵健秀作品中描写华女的笔墨不多,但读者不难从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感受到“父权”文化下女性丧失身份、地位低下、本性和思想双重受制,虽然在文本中华女们往往呈现出语言缺席的状态,但无法抹去她们遭遇了种族边缘化和性别歧视双重创伤的历史事实,如果她们长久被静音、无法释放自己的压抑也许将留下众多创伤后遗症,例如丧失本族裔归属感、被白人视为掘金者或带着复杂的猎奇心态接近和玩弄、引发性别冲突、损害华裔文学的活力等。

四、结 语

以创伤理论为切入点,对比论述了福克纳和赵健秀笔下创伤叙事过程中作家不同的书写立场对创伤群体疗愈的潜在影响。南方作家始终站在种族立场来批判白人的恶行,福克纳有选择地同情部分好黑奴但不愿触及种族创伤的根源,也并无任何支持废奴的实际举动,仅限于人道主义的谴责却不给黑人创伤叙事的权利实际上是变相美化种族差异、否认工业文明的正确性,不利于战后南方人面对创伤、修复创伤。赵健秀相对客观地借华工之口叙述父辈被白人主流文化欺压的事实,有利于重塑华裔男性形象,但其塑造的男性大多是参照白人的审美加以改良,不正视华裔男性外表的独特性可能使华人男性陷入被白人霸权文化“内化”的圈套,对书写创伤的初衷有一定影响。对于同族女性,两位作家持褒扬和攻击二元对立的态度,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不同程度地剥夺了“淑女”和“坏女人”的话语权,导致本族群女性迷失自我、压抑绝望,无法通过创伤叙事实现女性重建自我身份的自觉性。综上所述,将写作、叙事用于疗愈心理创伤是可行的,两个族裔的作家如能更加平和、冷静地看待造成创伤的历史事件,抛开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情感偏见,将更好地帮助受害者完成历史、身份的重构。

[参考文献]

- [1] CARR, ALAN. Michael White's narrative therapy [J]. *Clinical psychology in Ireland*, 2001 (4): 485-503.
- [2] FREUD, SIGMUND. 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 [M] // JAMES STRACHEY, ANNA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III*.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3-1974.
- [3] 威廉·福克纳. 八月之光 [M]. 蓝仁哲,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43.
- [4] FREUD, SIGMUND.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 [5] 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 [M]. 李文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6] SETH J. GILLIHAN. The healing power of telling your trauma story [EB/OL]. (2019-03-06) [2020-11-15].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think-act-be/201903/the-healing-power-telling-your-trauma-story>.
- [7] JEFFREY C ALEXANDER.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8] BARRET D. Trauma and dream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FRANK CHIN. *Gunga Din Highway* [M].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ress, 1994.
- [10] 威廉·福克纳. 押沙龙, 押沙龙! [M]. 李文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11] JUDITH L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 [12] 威廉·福克纳.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M]. 李文俊, 陶洁,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3] RICE, PHILIP&PATRICIA WAUGH.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M]. London: 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 2001.
- [14] MCMICHALE, GEORGE. *Concise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15] 赵健秀. 甘加丁之路 [M]. 赵文书,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6] CHEUNG, KING-KOK. The woman warrior versus the Chinaman pacific: Must a Chinese American critic choose between feminism and heroism? [M] // MARIANNE HIRSCH, EVELYN FOX KELLER, ed. *Conflicts in feminism*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17] UNITED NATION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family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9.

An Analysis of Different Writing Stances for Trauma Narratives between Souther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aking Faulkner's and Frank Chin's Works as Examples

DAI Fang-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rauma narratives of American Souther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re highly similar, but different time background, different nationality and identity attribute endow them with particularities of their own trauma, which form a strong contrast. Faulkner and Frank Chin, whose stances of writing about traumatic events are quite different, belonging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the trauma theory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ypical characters in their works, and study the writers' stances of trauma narratives between Souther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ealing trauma with writing.

Key words: the USA; Southern Literatur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rauma recovery

(责任编辑 陈蒙腰)